



# 明四夷馆鞑靼馆及 《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

A Study on the “Da Da Guan” of “Si Yi Guan” in  
Ming and Mongolian tribute-letters of “Hua-I-I-Yü”

乌云高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明四夷馆鞞鞞馆及 《华夷译语》鞞鞞“来文”研究

A Study on the “Da Da Guan” of “Si Yi Guan” in  
Ming and Mongolian tribute-letters of “Hua-I-I-Yü”

乌云高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四夷馆鞞鞞馆及《华夷译语》鞞鞞“来文”研究 / 乌云高娃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61 - 4242 - 4

I. ①明… II. ①乌… III. ①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译—汉字—研究 IV. ①H212.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0972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 涟 安 芳  
责任校对 刘 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493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序

东亚大陆自古以来便是一片众多民族居住的地方。近二千余年来，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主线之一，便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以定居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汉族人，与大漠南北草原游牧民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语言是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主要障碍。汉以前，中原周边各族多未有文字，因此这个时代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主要依靠舌人——即双语人的口头翻译来沟通。魏晋以后，东亚大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持续发展，中原周边各族陆续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各族间的交流也变得更为多彩，因而研习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学问——译学也应运而生。

译学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而原始资料的丰富与否则是影响学者选择研究视角的主要因素之一。遗留至今的有关中国古代译学史的主要资料集中于三个时期，各有其代表性主题：一是宋以前亚洲各民族间以研习、传播佛教为主的文化交流；其次是明代官办番语教习及与四夷馆有关的文献；其三是明中期以后随着传教士的入华而开始的西方文献的汉译。乌云高娃的专著《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关注的是上述第二个时期。

既往学界与蒙古学有关的《华夷译语》研究，多集中于元明两代各种蒙汉对译字汇，乌云高娃的研究从非母语研习的角度入手，深入地考察了明四夷馆的生徒录取程序、教学内容、考核制度、学制、教师来源和师生待遇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将研究推进至明鞑靼馆教学以外的职能，特别是首次对鞑靼馆“来文”作了非常深入研究。

在东亚大陆，与明清两代并存的朝鲜王朝也模仿四夷馆设置了外语教学机构——司译院，其中包括“四学”，即汉学、蒙古学、野人学（清代称清学）与倭学。因此，乌云高娃的上述研究，不但展示了明代官办蒙古语教育的主要方面，为前述农耕与草原两大文明交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样本，而且对近代以前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外语教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乌云高娃自幼入学后一直接受蒙古语教育，至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开始以汉文写作。她在自己的博士论文《明四夷馆及朝鲜司译院研究——以“蒙古语学”为中心》答辩通过之后，以十年之力悉心修改。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原论文迭经丰富增补以后的有关明四夷馆部分的内容，相信不同学术背景的读者，均能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刘迎胜

2013年7月23日于南京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切入点与创新处 .....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 .....	(3)
第三节 明四夷馆及“鞑靼馆”基本史料 .....	(14)
第二章 明四夷馆及“鞑靼馆” .....	(16)
第一节 明“四夷馆”的设立 .....	(16)
第二节 明“四夷馆”的具体位置 .....	(18)
第三节 “四夷馆”的演变 .....	(20)
第三章 “鞑靼馆”及其蒙古语教学 .....	(22)
第一节 “鞑靼馆”的教师与生徒 .....	(22)
第二节 “鞑靼馆”的考试与学制 .....	(31)
第三节 “鞑靼馆”的教学内容 .....	(36)
第四章 明四夷馆“鞑靼馆”的朝贡、贸易文书翻译 .....	(39)
第一节 明朝与蒙古的朝贡贸易背景 .....	(39)
第二节 鞑靼馆“译官”译审边贡文书 .....	(41)
第三节 鞑靼馆代译女真馆“来文” .....	(43)
第五章 不同版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情况 .....	(45)
第一节 各版本《华夷译语》所收鞑靼“来文” .....	(45)
第二节 《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编号 .....	(47)
第三节 《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	(52)
第六章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 .....	(56)
第一节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内容 .....	(57)
第二节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音译规则 .....	(64)

## 2 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

第三节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校释 .....	(78)
第四节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蒙古文还原 .....	(147)
第五节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译文 .....	(162)
<b>第七章</b>	<b>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 .....</b>	<b>(168)</b>
第一节	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内容 .....	(168)
第二节	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校释 .....	(173)
第三节	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蒙古文还原 .....	(202)
第四节	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文书格式 .....	(272)
<b>附录一</b>	<b>参考文献 .....</b>	<b>(300)</b>
<b>附录二</b>	<b>索引 .....</b>	<b>(307)</b>
<b>附录三</b>	<b>汉、蒙语汇对照索引 .....</b>	<b>(315)</b>
<b>后记</b>	<b>.....</b>	<b>(328)</b>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切入点与创新处

自古以来，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民族有着频繁的交往。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的游牧文明之间，不同民族之间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当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时，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语言文字的翻译问题。在不懂得彼此语言文字的情况下，需通过译者作为媒介，才能够进行交流与沟通。长期以来，译者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沟通语言的中间人的作用。

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原与周边的民族有了频繁的交往，这一时期译者的活动亦非常活跃。汉、唐以来中原王朝以汉语为官方语言，在朝廷内部不需要译者，只有在外交关系方面才需要翻译人员。这一时期，译者主要以口译人员为主，虽然有笔译者，但主要以翻译佛经为主。当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统治王朝之后，例如，契丹、女真、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辽、金、元朝等多元民族国家之后，统治者不通汉语，不识汉字，君臣、官员之间随时需要通过译者才能进行语言文化方面的交流。契丹统治者常令通事翻译汉语，而女真人则在汉地当官皆设置通事，蒙古统治者更是设置了大量的专职翻译人员。而且，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不仅在外事方面需要翻译人员，在朝廷内部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

从事翻译工作者有口译人员和笔译者之区别。充当口译者有时只需要懂语言即可，不识文字也无妨。但从事笔译者则大不相同，懂得语言的同时也需要识双方的文字。充当口译者掌握其他民族、国家的语言的途径主要有通婚、多民族杂居、战争俘虏等情况。但充当笔译者必须有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笔译人员的培养与语言文字的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人们对译者的需求的增长，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亦出现了官方设立的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机构，其目的应该是重点培养兼通语言文字的笔译人员。笔者将这些培养翻译人员并兼负翻译工作的机构命名为“译学”。“译学”兼有进行双语教学与担负翻译工作的双重性质。

汉、唐、宋时期，统治者与朝廷官员基本上由汉族组成，朝廷内部交流只需用汉语即可，并不需要很多的译者，这一时期，尚未出现过官方设立的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机构。充当译者的人可能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多民族杂居、在战争中被俘虏等情况下掌握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而充当“译者”的。

金元时期，汉语作为唯一官方通用语的现象有所改变，在官方语言教学中也出现了教习

## 2 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

女真、蒙古语言文字的情况。那么，金朝所设的女真语学校和元代设立的“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是否能称得上“译学”机构呢？由于史料不足，金朝的女真语学校和元代的“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的具体教学内容尚不清楚，金朝的女真语学校是否进行过女真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元代的“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是否进行过蒙古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这些学校的教授和生徒是否从事翻译工作不得而知。但是，金代女真语学校和元代的“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的设立目的很有可能与培养翻译有关，至少可以肯定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员，其中有一部分人应该充当过朝廷的翻译人员。

古代早有译官的培养，但是，设立培养译官的专门机构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明代的四夷馆、清代的四译馆均属于官方设立的“译学”机构。明四夷馆和清四译馆进行汉语与非汉语的双语教学，同时，这里培养出来的译官负责政府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

明朝是继元朝多元民族国家之后由汉族建立的统治王朝，这一时期与汉、唐、宋一样，汉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但是明朝与汉、唐、宋朝不同，经过契丹、女真、蒙古等边疆民族在中原的统治，不得不使明朝对蒙古、女真等族随时进行提防。为了了解蒙古、女真的情况及其动向，明朝非常重视译者的培养问题，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在永乐五年（1407）专门设立四夷馆，内设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百、暹罗等十馆，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

明灭元之后，亦与北元有着外交关系，为了培养与北元交往的翻译人才，明政府在四夷馆设“鞑靼馆”，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兼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鞑靼馆培养的兼通蒙、汉语言文字的“译官”在明与蒙古、女真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那么，为何说在四夷馆有女真馆的情况下，鞑靼馆“译官”在明与女真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呢？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自明正统九年（1444）以后开始，女真各部逐渐放弃使用女真文字，开始使用蒙古文字，女真与明朝交往时，出现了往来文书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现象。而且有史料证明明四夷馆“鞑靼馆”的翻译人员在负责翻译明与蒙古的往来文书的同时，曾经代译过“女真馆”的来文。由此可见，在满族使用蒙古语、借助蒙古文字创制满文之前，明代的女真人已经深受蒙古语言文化的影响，可以肯定明代女真人中有一些通蒙古语言文字的人。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继承明代传统，将四夷馆改为四译馆，继续进行诸蕃语言文字的教学并培养通诸番语言和汉语的翻译人员。但清朝统治者裁掉了四译馆中的鞑靼馆和女真馆。裁撤女真馆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满族早已不再使用女真文字，已开始使用满文，并不需要通汉语和女真语言文字的翻译。裁撤鞑靼馆的原因也许与漠南、漠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之后不再是“外夷”，蒙古语言文字也成为清朝政府的通用语之一，清朝政府中并不缺少通蒙古语者有关。此外，在清朝满语成为国语，满语与汉语、蒙古语并用。因此，清朝政府设立八旗官学，给八旗满族和蒙古族子弟教习满语和蒙古语。清朝政府在科举中也特设了翻译科考试，用来选拔满文和蒙古翻译。这也是清朝将四译馆中的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的原因之一。

清朝培养从汉语翻译成满语、再从满语翻译成蒙古语的译者，即培养这种在朝廷内部所需的翻译的情况与金、元两朝的女真语学校和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培养翻译基本相似。这与我所界定的译学机构有所区别。清朝将培养通诸番语言文字的翻译和培养满语、蒙古语的

翻译没有等同对待。两者的重要性和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在四译馆培养兼通汉语和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百、暹罗、朝鲜、苏禄、南掌、西洋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这属于我所命名的“译学”范畴。从清朝的这种两个体系的培养翻译人员的机构，清楚地看出，金、元的女真语学校、蒙古语学校和清朝的八旗官学教习满语和蒙古语，主要是选拔朝廷内部所需的翻译人员，对朝廷来说非常重要，应该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明四夷馆、清四译馆是培养和选拔在外交、朝贡贸易中充当翻译者，重视程度及其性质都与前者有所不同。

本书以中国、日本、德国图书馆保存的鞑靼馆“来文”为中心，对明四夷馆鞑靼馆“来文”进行校释，探讨明代四夷馆的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译官的活动等问题。

首先，通过对现存的明四夷馆鞑靼馆“来文”蒙汉文部分进行比勘对照，加以注解，可分析当时鞑靼馆教授、译字官、译字生掌握蒙古语的情况及翻译水平。其次，通过对洪武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来文”进行拉丁转写，还原成蒙古文原文，寻找明代以汉字标记蒙古语的特点及其拼写规律。

此项研究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探讨蒙古语言文字教育史，对研究明代蒙古文书翻译及译官的活动等问题，也有所裨益。其次，探讨明朝与周边民族的朝贡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原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而且也具有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1. 明四夷馆鞑靼馆的译官有代译女真馆“来文”的现象，其原因是自明正统九年（1444）开始，女真人与明朝往来的文书改用蒙古文字书写，这证明当时除了明朝有官办学校教习蒙古文字之外，明代的部分女真人也有可能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这可能是清初满族人中有不少通蒙古语者，并根据蒙古文字创制满文的背景之一。

2. 在日本东洋文库、德国柏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的《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来文”进行比较，发现这些鞑靼馆“来文”中有以蒙古语书写的女真馆“来文”，这证明明四夷馆鞑靼馆的译官确实曾经代译过女真馆“来文”。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开展明四夷馆鞑靼馆的研究，对明代女真史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史料。

## 第二节 前人研究

笔者在检索前人研究时注意到，国内外学者虽对明四夷馆有所研究，但尚未出现全面探讨整个“译学”中蒙古语教习活动的论著，且这一语言学界早已关注的课题，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过去学者只是在探讨《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问题时，提到过上述两书的编撰目的是作为教习蒙古语的教科书，而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翻译人员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不够。

换言之，既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译语的研究。在对四夷馆各馆的研究中，对女真馆、回回馆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进步，而关于鞑靼馆及其蒙古语教学、蒙汉翻译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有关鞑靼馆的研究情况，他们的研究多是语言学的，从史学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



#### 4 明四夷馆鞞鞞馆及《华夷译语》鞞鞞“来文”研究

学界对四夷馆的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等问题也不够重视。

##### 一 对明四夷馆的研究

前人有关明四夷馆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sup>①</sup>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后来是否改属太常寺这一问题，作者依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明史》职官志记载之误”<sup>②</sup>。

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sup>③</sup>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吕维琪的《四译馆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馆的规章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明四夷馆的珍贵史料。那波利贞的《四译馆则》<sup>④</sup>一文，介绍了日本富冈谦藏氏所藏《四译馆则》，并对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以肯定。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sup>⑤</sup>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巴黎本）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sup>⑥</sup>一文，在向达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指出此书实际上是四夷馆译字生的学习参考书，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在四夷馆（或清四译馆）内部流传，清乾隆时禁毁书目中未见其名或许与此有关。此书主要是以李贤的《大明一统志》、郑晓的《皇明四夷考》和《皇明北虏考》为基础写成的，同时涉及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的部分内容。其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记载的隆庆、万历年间鞞鞞、暹罗等历史，以及有关四夷馆活动的内容。

刘迎胜师的《宋元至清初我国外国语教学史研究》<sup>⑦</sup>、《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言教学教材源流研究》<sup>⑧</sup>和《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流》<sup>⑨</sup>等论文，探讨了明四夷馆的设立、回回馆的波斯语教学等问题。他在后一文中，指出北魏时初设四夷馆，为外国使臣居住的宾馆，包括金陵、燕然、扶桑、崦嵫等四馆。并认为明代的四夷馆不同于前代，它主要是一个

① 神田喜一郎：《明の四夷館に就いて》，《史林》第12卷第4号，1927年，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田坂兴道：《最近における四夷館及び華夷譯語の研究》，《东洋学报》第33卷第3、4号合刊本，1951年，第145页。

④ 那波利贞：《四译馆则》，《史林》第13卷第3号，1928年，第145—146页。

⑤ 向达：《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收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3—660页。

⑥ 张文德：《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第89—100页。

⑦ 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国语教学史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2—118页。

⑧ 刘迎胜：《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言教学教材源流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104—109页。

⑨ 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流》，《学术集林》卷7，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203页。

语言、文字的翻译机构和学习机构。<sup>①</sup>

特木勒的《明暹罗馆设置考》<sup>②</sup>一文，探讨了四夷馆增设暹罗馆的背景、暹罗馆的设置情况、握闷辣等人在中泰两国关系史上的作用等问题。他的《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sup>③</sup>一文，指出四夷馆在明朝迁都前在南京的位置是在长安右门外。

乌云高娃的《14—18世纪东亚大陆的“译学”机构》<sup>④</sup>一文，指出四夷馆在北京的位置不是在长安右门外，而是设在长安左门外。她的《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sup>⑤</sup>一文，对明四夷馆及鞑靼馆的设置年代、鞑靼馆的蒙古语教学及其内容、鞑靼馆译官的文书翻译活动等问题作了探讨。指出明初鞑靼馆缺少教师，四夷馆各馆缺教师时，从本馆年深职官内，选擅长翻译，行为端正者中挑选。自1566年开始，四夷馆生徒专从世业子弟中挑选。鞑靼馆“译语”和“来文”是鞑靼馆教习蒙古语的主要教科书。鞑靼馆负责翻译明与北元、女真部交涉事务中的朝贡、贸易外交文书。馆中教师、译字官、译字生，都参与文书翻译工作。有时为了验放夷人进贡“表文”，鞑靼馆官生经常被派到边关。鞑靼馆除了翻译明与蒙古的往来文书之外，代译女真馆文书。因此，翻译任务非常繁忙。

## 二 对《华夷译语》的研究

《华夷译语》是四夷馆十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撰的番汉合璧教科书。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多有研究。《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编撰的诸番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番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狭义的《华夷译语》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

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钁板刊行。只有蒙古译语一种。由译语和“来文”两部分组成。译语有汉字音译蒙古语，没有蒙古语原文。“来文”部分有汉字音译蒙古语，汉文直译，汉文义译等。

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清朝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番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抄本的内容有所不同。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中国进贡表文。会同馆本《华夷译语》是明末茅瑞征所辑，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番语言，没有诸番语言的原文，而且，缺少“来文”部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称洪武本《华夷译语》为甲种本、永乐本《华夷译语》为乙种本、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为丙种本。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同这种分类法。

日本学者关于《华夷译语》的研究，早在幕府时代末年，近藤守重将试图对《华夷译

① 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流》，《学术集林》卷7，第179、191—192页。

② 特木勒：《明暹罗馆设置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特木勒：《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2009年12月。

④ 乌云高娃：《14—18世纪东亚大陆的“译学”机构》，《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3期。

⑤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语》进行研究。在所著《安南纪略稿》（《近藤正斋全集》卷一，第86—93页）中，收入了有关丙种本《华夷译语》中“安南馆译语”的研究。

日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之于世。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明治四十年（1907），内藤湖南以“日本满洲交通略说”为题进行演讲，涉及《华夷译语》的解题、已往的研究状况等问题。并试图对《吾妻镜》中女真文字四字铭进行解释。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他在大阪“每日新闻”以谈话笔记的形式发表了《〈华夷译语〉的发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并将自己得到的明抄本公布于世。明治三十一年（1902），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一文，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那么，其《〈华夷译语〉的发现》一文的发表，也称得上是日本学者研究《华夷译语》的开端。

羽田亨的《〈华夷译语〉的编者马沙亦黑》（《东洋学报》，第七卷第三号，1917年）一文，认为马沙亦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有关，但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没有关系。

鸳渊一、村上嘉实的《关于新〈华夷译语〉》（《史林》，第十七卷第二号，1932年）一文，介绍了新《华夷译语》的情况。此文的研究对象不属于石田干之助所提出的甲、乙、丙三种版本《华夷译语》系统。这里所谓新《华夷译语》是指德国学者福克斯发现的我国故宫所藏的一批《华夷译语》。这批《华夷译语》应是1748年，清四译馆改为会同四译馆之后所编撰的版本。包括36种语言或方言。1943年石田干之助提出对《华夷译语》应该另立新类。自1968年开始，日本学术界将这批《华夷译语》命名为丁种本。后来，1973年西田龙雄又称此《华夷译语》为“多续《华夷译语》”。

外山军治的《关于阿波国文库〈华夷译语〉》（《史林》，第二十三卷第三号，1938年）一文，篇幅很短，认为《华夷译语》不单是一种诸番语言的辞典，对史学、语言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山崎忠的《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朝鲜学报》第五辑，1953年）和《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补遗》（《朝鲜学报》第六辑，1954年），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状况，就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史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为我们了解日本早期学者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提供了线索。他对《华夷译语》甲种本、乙种本都有所研究，他一人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就有十多篇。

他的《关于〈华夷译语〉的资料——以所谓甲种本为中心》（《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一辑，1950年10月），《关于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用字》（《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五辑，1951年10月），《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研究》（《天理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一号，1951年）及《增订〈华夷译语〉语释（1）——所谓甲种本的语汇部分A》（《天理大学学报》第4卷第3号，1953年）等文章，对洪武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的用法、语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我国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有闻宥先生在1977年撰写的未刊遗稿《国外对于〈华

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兼介绍西田龙雄的〈研究丛书〉》<sup>①</sup>。该文简单介绍了英国、法国、日本所藏《华夷译语》的情况，并介绍了西田龙雄计划出版的《〈华夷译语〉研究丛书》。

冯蒸的《〈华夷译语〉调查记》<sup>②</sup>一文，对《华夷译语》的分类、北京地区《华夷译语》的调查、九种《川番译语》、《译语》和《河西译语》等问题作了介绍。

乌云高娃的《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研究状况及史料简介——以“蒙古语学”为中心》<sup>③</sup>一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的研究状况及基本史料做了介绍。

乌云高娃的《朝鲜司译院的“类解书”与〈华夷译语〉》<sup>④</sup>一文，根据《译语指南序》的记载，认为15世纪朝鲜司译院编撰的汉、蒙、倭、女真语学的分类辞书与明代《华夷译语》有承传关系。司译院根据《译语指南》编纂了蒙、倭、女真学的分类辞典，命名为《物名》。17、18世纪司译院官员在《译语指南》、蒙、倭、女真学《物名》的基础上，对司译院的“类解书”进行修订，对汉、蒙、倭、清学的分类辞书，分别命名为《译语类解》、《蒙语类解》、《倭语类解》、《同文类解》。可见，司译院的“类解书”与《华夷译语》有一定的承传关系。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和《蒙古秘史》音译年代的先后问题也有所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那珂通世、内藤湖南、服部四郎、石田干之助等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在先，另一种是小林高四郎和村山七郎所持的《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为先的观点。这里提到的《华夷译语》，主要是指编撰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的甲种本。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实录》（大日本图书，1907年版，1943年新版，筑摩书房）序文中指出：《华夷译语》取元朝秘史为参考，对蒙古语的音和意都进行了汉译，因此，首先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汉字音译，并对词语及段落，进行了汉译（旁译和总译）。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解历史，而是为了理解蒙古语。所以那珂通世认为《华夷译语》成书年代晚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中，将《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年代与《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进行比较，断定《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为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到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之间。并认为《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者，也许是《华夷译语》的编撰者翰林院侍讲火源洁、马沙亦黑等。村山七郎在《关于〈华夷译语〉与〈元朝秘史〉的成立先后问题的解决》（《东方学》第二十二号，1961年）一文中，也认为是《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要早于《蒙古秘史》的汉译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小泽重男在《元朝秘史》（岩波书店1994年版）中，认为《元朝秘史》是在编修《华夷译语》的过程中进行汉字音译的，《元朝秘史》的正卷卷一、卷二是与《华夷译语》的语汇部分一起进行汉字音译的。

① 闻宥：《国外对于〈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兼介绍西田龙雄的〈研究丛书〉》，（张永言先生提供）《学术集林》卷7，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249页。

②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年第2期，第57—68页。

③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研究状况及史料简介——以“蒙古语学”为中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5辑，2002年8月。

④ 乌云高娃：《朝鲜司译院的“类解书”与〈华夷译语〉》，《华夷译语论文集》，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2007年10月。

德国学者福克司 (Walter Fuchs) 发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寿安宫) 的一部《华夷译语》与石田干之助所划分的甲、乙、丙三种版本的《华夷译语》有所不同, 这批《华夷译语》原藏于故宫方略馆, 但这批《华夷译语》是属于清四译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纂的教科书。福克司将这批《华夷译语》命名为新《华夷译语》。他在《关于新〈华夷译语〉》一文中, 介绍了这一版本《华夷译语》的情况。<sup>①</sup> 1968年日本学者将此版本的《华夷译语》定名为丁种本。<sup>②</sup> 笔者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作图书卡片, 认为应将这批《华夷译语》命名为清写本《华夷译语》。

乌云高娃的《清四译馆“西洋馆”》<sup>③</sup>一文, 对清四译馆的设置及演变、清写本《华夷译语》中的“西洋馆”杂字、西方传教士与“西洋馆”等问题进行探讨, 指出清代的四译馆是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清写本《华夷译语》是保留至今的清四译馆所用教科书之一。根据清写本《华夷译语》中的“西洋馆杂字”, 认为清代的会同四译馆应该增设过“西洋馆”。

### 三 对诸番“译语”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情况也有所不同。有关女真馆译语、日本馆译语、朝鲜馆译语、回回馆译语、鞞鞞馆译语等, 日本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而其他各馆译语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专题性论文少。20世纪50年代之前, 《华夷译语》诸番“译语”中, 日本学者除了对“暹罗馆译语”未进行研究外, 对其他各馆“译语”均有所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及各馆“译语”的研究, 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关于“女真馆译语”石田干之助的研究成绩显著。他的《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sup>④</sup>一文, 将《华夷译语》详细地分为甲、乙、丙三种版本, 并介绍了乙、丙种版本的所藏情况。列出载有“女真译语”的乙种本的六种抄本以及《华夷译语》丙种本的九种抄本。他所列乙种本的六种抄本分别为: (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抄本, 明抄本二十四册。(2) 柯劭忞所藏明抄本。(3) 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4) 内阁文库所藏抄本。(5)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华特搜集》中的称为《译字》的抄本。(6) 内藤博士所藏抄本。丙种本的九种抄本分别为: (1) 伦敦大学学院所藏罗伯特·莫里逊收藏的明抄本。(2) 近藤守重目睹并著录于《正斋书籍考》的本子。(3) 松泽老泉著录于《汇刻书目外集》的本子。(4) 河内所藏法国远东学院的本子。(5) 稻叶君山秘藏本, 内藤博士本和京都帝国大学本是此秘藏本的副本。(6) 水户彰考馆所藏本。(7) 清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见所谓“十国译语”的本子。(8) 静喜堂文库所藏本。(9) 德岛市光庆图书馆内旧阿波国文库所藏本。并认为续编的《华夷译语》载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鞞鞞、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刺加、女直、百夷等13种语言的对译语汇。他的《女真语杂俎》(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1940年)

① 福克司:《关于新〈华夷译语〉》,《辅仁英文学志》第8期,民国二十年(1931)十二月出版,第91—97页。  
Walter Fuchs: Remarks on a new “Hua-I-I-Yü”,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eking, No. 8, 1931.

② 大友信一、木村晟:《日本馆译语》,东京洛文社1968年版,第37页。

③ 乌云高娃:《清四译馆“西洋馆”》,澳门政府文化局《文化杂志》第53辑,2004年冬季刊。

④ 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の新资料》,刊于(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第1271—1312页。

一文，借助格鲁伯所校勘的《华夷译语》，对《方氏墨谱》所见女真字铭文进行了考释。并在文章之后附录静喜堂文库所藏本中的“女真馆译语”部分。

稻叶岩吉的《吾妻镜女真字的新研究》<sup>①</sup>一文，就“女真馆译语”语汇部分进行了研究。秋山谦藏的《镰仓时代女真船的来航——〈吾妻镜〉的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中的女真文字的比较》<sup>②</sup>一文，介绍了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并对《吾妻镜》的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中的女真文字，进行了比较研究。渡部熏太郎的《女真语的新研究》<sup>③</sup>一文，对阿波文库本、静喜堂本、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中提到的资料进行校订，并对“女真译语”语汇进行注解。山本守的《静喜堂本“女真馆译语”考异》<sup>④</sup>一文，考释了阿波文库本和静喜堂本“女真译语”的异同。

日本学者关于“日本译语”的研究，有伊波普猷的《介绍日本译语》<sup>⑤</sup>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对“日本馆译语”全部语汇进行了研究。秋山谦藏的《明代支那人的日本語研究》<sup>⑥</sup>一文，论述了《华夷译语》编撰的缘由、藏书状况等问题，以会同馆本“日本馆译语”为基础，根据其分类对“日本寄语”进行了研究。浅井惠伦的《校本日本译语》<sup>⑦</sup>一文，没有对“日本馆译语”语汇进行注释，以伦敦本为底本，对阿波本、静喜堂本、稻叶本“日本译语”进行校订，并指出异同。另外，有服部四郎的《“琉球馆”和“国语”的音韵法则（二）》<sup>⑧</sup>。

渡边三男的《关于〈华夷译语〉及“日本馆译语”》（1）、（2）<sup>⑨</sup>一文，就《华夷译语》丙种本中的“日本馆译语”的语汇进行了注解。还有大友信一、木村晟的《日本馆译语》<sup>⑩</sup>一书。

关于《华夷译语》“朝鲜馆译语”，有小仓进平的《“朝鲜馆译语”语释》（上、下）<sup>⑪</sup>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就《华夷译语》丙种本中的“朝鲜馆译语”中的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衣服、声色、珍宝、文史、数目、干支、卦名、通用等18个门类，共596个词汇进行了注解。提出甲种本《华夷译语》只有“蒙古译语”一种，因此，可将其命名为“华蒙译语”或“华鞑译语”。并认为《华夷译语》对研究明代语言来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日本学者当中，首先对“回回馆译语”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津吉孝雄。田坂兴道和本田实

① 稻叶岩吉：《吾妻镜女真字的新研究》，《青丘学丛》第九号，1931年。

② 秋山谦藏：《镰仓时代女真船的来航——〈吾妻镜〉的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中的女真文字的比较》，《历史地理》第六十五卷第一号，1935年。

③ 渡部熏太郎：《女真语的新研究》，《亚细亚研究》第十二号，1935年。

④ 山本守：《静喜堂本“女真馆译语”考异》，《书香》第十六卷第十号，1943年。

⑤ 伊波普猷：《介绍日本译语》，《方言》第二卷第九号，1932年。

⑥ 秋山谦藏：《明代支那人的日本語研究》，《国语和国文学》第十卷第一号，1933年。

⑦ 浅井惠伦：《校本日本译语》，《安藤教授还历祝贺纪念论文集》，1940年。

⑧ 服部四郎：《“琉球馆”和“国语”的音韵法则（二）》，《方言》第二卷第九号，1932年。

⑨ 渡边三男：《关于〈华夷译语〉及“日本馆译语”》（1）、（2），《驹泽大学研究纪要》第十八、十九辑，1960年、1961年。

⑩ 大友信一、木村晟：《日本馆译语》（本文和索引），东京，洛文社1968年版。

⑪ 小仓进平：《“朝鲜馆译语”语释》（上、下），《东洋学报》第二十八卷第三、四号，1941年。

信两位学者在“回回馆译语”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津吉孝雄的《关于回回馆译语》<sup>①</sup>一文，介绍了“回回馆译语”的情况，并对“回回馆译语”中的一些波斯语词汇进行了研究。

田坂兴道的《有关“回回馆译语”的觉书》<sup>②</sup>一文，在石田干之助的研究基础上，介绍了《华夷译语》的版本和抄本。并认为小仓进平的《“朝鲜馆译语”语释》一文的发表，可以说是《华夷译语》研究史上的一大伟观。他的《“回回馆译语”语释》（一）至（四）<sup>③</sup>，就“回回馆译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对“回回馆译语”中的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身体、宫室、鸟兽、花木、器用、衣服、饮食、珍宝、声色、文史、方隅、数目、通用等18个门类的词汇进行了注释。他在石田干之助的研究基础上，在《“回回馆译语”语释（一）》一文中，列出了乙种本的十种抄本和丙种本的九种抄本。乙种本的十种抄本分别为：（1）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抄本，明抄本二十四册。（2）柯劭忞所藏明抄本。（3）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4）内阁文库所藏抄本。（5）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华特搜集》中的称为《译字》的抄本。（6）内藤博士所藏抄本。（7）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抄本，清代抄本。（8）巴黎亚洲协会抄本，清康熙年间抄本。（9）Edkins旧藏现大英博物馆藏本，明代版本。（10）京大·东洋文库·Edkins旧藏别本·神田教授所藏本。丙种本的九种抄本与石田干之助的所列相同。

另外，他的《“回回馆译语”及其国际性》<sup>④</sup>一文，篇幅虽短，但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论点。他认为回回馆“译语”和“来文”，对东西交涉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够反映明代东西交涉史的实态。不仅东西土耳其斯坦和伊朗各地方国家，要通过回回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往来。而且，西亚、非洲以及欧洲国家乃至南亚诸国的一部分，也要通过回回馆与明朝通好。四夷馆中单回回馆一馆，就不只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交往，在明朝与世界的各国经济、文化交往中，起到了极为广泛的国际性作用。

在田坂兴道之后，本田实信对“回回馆译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的《关于“回回馆译语”》<sup>⑤</sup>一文，将西德杜宾根大学等六个海外图书馆藏本与日本的几种抄本进行互校。

辻直四郎的《西天馆译书调查报告（序言）》<sup>⑥</sup>一文，是最早试图对“西天馆译语”进行研究的论文。

关于《华夷译语》“西番馆译语”，有西田龙雄的《丙种本“西番馆译语”研究》<sup>⑦</sup>一文。他的《多续译语研究》<sup>⑧</sup>，对故宫所藏所谓的新《华夷译语》，日本学者定为丁种本的《华夷译语》进行了研究。

① 津吉孝雄：《关于回回馆译语》，《东洋史研究》，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

② 田坂兴道：《有关“回回馆译语”的觉书》，《回教圈》第六卷第五号，1942年。

③ 田坂兴道：《“回回馆译语”语释》（一）至（四），《东洋学报》第三十卷第一、二、四号，1943年；第三十三卷第三号，1951年。

④ 田坂兴道：《“回回馆译语”及其国际性》，《东洋史研究》第八卷第一号，1943年。

⑤ 本田实信：《关于“回回馆译语”》，《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十一辑，1963年。

⑥ 辻直四郎：《西天馆译书调查报告（序言）》，《东洋学报》第三十一卷第二号，1947年。

⑦ 西田龙雄：《丙种本“西番馆译语”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辑，1963年。

⑧ 西田龙雄：《多续译语研究》，京都，松香堂，1973年版。